


红色收藏



吴吉昌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的奖状,表彰其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闻喜县档案馆藏)

爱国种棉攀高峰

宋志强

1978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穆青、路拂为、廖由滨的长篇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在全国引起轰动。一位农村老人为实现总理的嘱托,日夜前行于科学种棉的事业中,他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这位老人就是山西省闻喜县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

吴吉昌出生于山西省闻喜县涇阳村,祖祖辈辈以种西瓜为生,心灵手巧的吴吉昌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种瓜能手。新中国的诞生使吴吉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1959年春天,吴吉昌得知国家急需棉花作为工业原料,“爱国家,种棉花”的念头在吴吉昌的心中涌起,他建议生产队改种棉花。为了能随时研究棉苗生长,吴吉昌搭个窝棚住在棉花试验田里,每天吃饭由老伴送,78天没有回过家。最后实验的结果,吴吉昌的试验田比普通水浇地棉田的产量多了一倍多,比旱地棉田多了近四倍。就在这一年,吴吉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以来,吴吉昌先后创造和运用“冷床育苗”“一窝双株”“巧留油条”等多项植棉技术,为棉花全苗壮苗、早发稳长、增蕾保桃、减少脱落、稳定高产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接见这位土生土长的农民科学家。

1966年1月,全国第五次棉花工作会议之后,周恩来总理请十几个劳动模范座谈,其中就有吴吉昌。总理对他说,老吴啊,主席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决棉花增产的问题。当时总理还问他,你多大年纪。他说,我57岁。周总理说,我67岁,我们要用20年的时间完成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行不行?吴吉昌爽快地回答道,行!回到家乡,吴吉昌日夜在棉田里观察研究,连吃饭都端着碗蹲在地头,人们说,“棉花迷”变成“棉花疯”了。

吴吉昌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继“一株双秆”之后,又培育出一种“多秆两层”新株型棉花。在解决棉花脱蕾落桃这个科学难题上,吴吉昌从栽培体系方面闯出了一条道路。他的植棉技术在北方广大棉区获得推广。

1978年,吴吉昌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表彰其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1979年12月,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山西省档案馆供稿

五代都押衙记铜印

林立白



五代“元从都押衙记铜印”,现藏于天津市博物馆,长6厘米,宽4.8厘米,高2.3厘米,长方形,背铸鼻钮,钮顶呈半圆形,片状。体轻且薄,通体褐色,间有绿锈斑。

印文为窄边朱文楷书两行六字“元从都押衙记”。“元从”始于唐高祖的“元从禁军”,凡被授予者,皆享有一定的特权。“都押衙”是官名,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皆擅设衙官,于是衙将、衙官、都押衙等官名日新繁杂。“元从都押衙”系军师亲重之官,多见于五代史书。

五代时期官印传世极少,此印对研究我国五代时期有关史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物证。

融·汇

——西藏拉萨当雄墓地



当雄墓地出土的石质黑白围棋子



当雄墓地出土的雄狮鸟纹金耳勺

揭秘“诸葛碗”



“诸葛碗”(太原市博物馆藏)

用品,主要用于食物保温,有“温碗”的作用。将开水从外碗底的孔注入碗中夹层,再用一个特制的木塞塞住,就可以保持碗内食物的温度;食用特别滚烫的食物时,夹层碗、腹部空心的瓷碗则可以化解烫手难题。不过这个猜测也引发一些质疑,因为“诸葛碗”本身盛东西就少,也烫不到哪里去。

还有一种说法,“诸葛碗”的重要使命是祭祀用器,它作为供奉器而存在,在祭祀时,少量的供物也可呈现宏大的场面;而又因为夹层烧制时容易爆裂,故在碗底预留孔洞走气。

(本文选自太原市文物局编著《听得见的博物馆》)

山字纹镜

刘昊宇



六山纹镜(国家博物馆藏)



四山纹镜(山西博物院藏)

战国铜镜的纹饰丰富多彩,仅几何图纹就有山字纹、菱形纹、连弧纹等。其中,山字纹镜是战国铜镜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种,堪称战国铜镜的典范之作。

山字镜,是指在镜背上存在显著山形主体图形要素的铜镜品种,它何时开始出土和被收藏、著录,尚乏资料可考。从故宫博物院藏有山字镜推测,至迟清代宫内已有收藏。清代梁廷枏在《藤花亭镜谱》中为此类镜取名“山字镜”,由此得名。镜中的主题纹饰即山字纹,一般均呈左旋或右旋排列。

山字具有高大、稳重、险阻的含义。山是象形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像山峰并立的形状。山是汉字的一个部首,以山作意符的字多与山有关。

山字纹镜中的山字纹,在数量上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之分。从现有资料看,四山镜是最多的,三山、六山极少。山字纹镜的地纹有羽状纹、云雷纹;以变形花叶、柿蒂、竹叶等纹饰作为中间纹。在国家博物馆珍藏有一件精美的六山纹镜,既是楚国铜镜艺术的巅峰成就,亦是战国镜中的“大名鼎鼎”品种,遗存极少,全世界数不过十,珍贵异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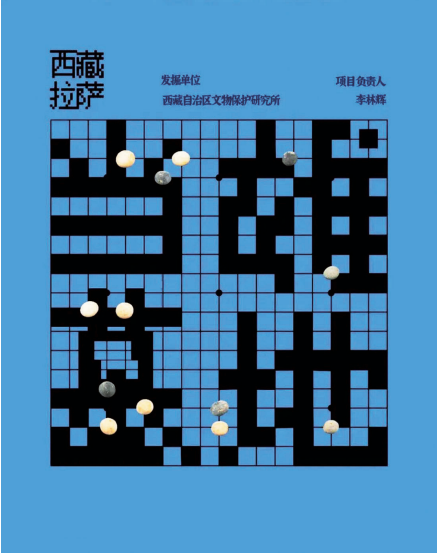
山西博物院藏有一枚战国时期的四山纹镜,镜中央的钮座为方形,饰三弦纹,在钮座外装饰有凹面方格。地纹为细密清晰的羽状纹,地纹上从方格四角伸出四组叶纹,每个山字底边与方钮座四边相对。

对于山字镜纹饰的寓意众说纷纭。

第一种说法认为表现大自然,以山为主题,万物生灵生存其间,清代学者梁廷枏,在《藤花亭镜谱》中收录了一面战国四山镜镜谱,认为这是“刻四山形以象四岳,此代形以字”。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青铜器上勾连云雷纹的演变,表现闪电现象,对自然的敬畏。

西藏拉萨当雄墓地



当雄墓地海报

散且不完整,推测应为二次捡骨葬,个别有烧骨现象,未发现葬具痕迹,部分墓室四壁和底部进行了硬化处理,个别见铺有碎石和木炭等。随葬动物骨骼现象较为普遍,可辨认个体主要有狗、马、牛、羊等。

位于唐蕃古道上的当雄墓地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均显示出其吐蕃时期文化特征,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墓葬年代为公元7至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发掘出土的雄狮鸟纹金耳勺、石质黑白围棋子、青金石,以及珊瑚、松石、珍珠等各类珠饰等均显示出其与中原文化,以及与周边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相关性,展示了吐蕃时期唐蕃古道上早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特别是围棋子,是中原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表明了吐蕃与中原在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封土、梯形石墙、穹窿顶石室墓等墓葬形制都是典型吐蕃式墓葬的特征,彩绘陶片上的赭面人物形象更是与文献记载的吐蕃人的妆容习俗完全吻合,系青藏高原首次考古发现。同时,当雄墓地也是迄今为止在西藏吐蕃考古出土金銀器数量最多的一次。

当雄墓地考古发掘首次科学完整揭示了吐蕃腹心的西藏拉萨地区封土墓考古学文化面貌,为进一步了解西藏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对于重现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盛况,探讨唐王朝与吐蕃关系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据国家文物局网

昼出耘田夜绩麻

方吉



《豳风·七月》(作者不详)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劳动场景、劳动者形象都是重要的艺术表现对象。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我们展示文物中古代劳动者的身影,谨以此向劳动者致敬!

乐观勤劳的汉农夫执锺箕俑



汉农夫执锺箕俑(中国农业博物馆藏)

我国多地曾出土过一种汉执锺箕俑,它的形象来源于汉代农夫,其中最著名的一件藏于中国农业博物馆。

该俑头戴笠帽,一手持锺,一手持箕,腰插长刀,脚踏草鞋,面部表情生动,嘴角露出微笑。高卷的裤腿,有力的双脚,展现出乐观勤劳、善良可亲的劳动者形象。

木柄铁口锺是汉代常见的起土工具,相当于后来的锹,用于深耕,在浚河、建土台、筑墙等土方工程中也需用锺。

这位农夫为何佩刀?学界认为,农夫还充当着地主的家丁。根据东汉农学家崔寔所作《四民月令》记载,自从汉光武帝刘秀实行度田的新举措后,豪强大族的私家武装便由农民组成。

《捣练图》上的劳动妇女



《捣练图》(宋摹本,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

人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古代也是如此。在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很高,据史料记载,唐代劳动妇女间存在一种名为“女人社”的互助组织,该组织不依赖官府,完全独立运作,设有社长、录事、社老等负责人,其宗旨是“危则相扶,难则相救”。

在千古流传的画作中,有一幅清晰地记录了唐代妇女协同劳动的情景。这幅唐代画家张萱所绘的《捣练图》是一幅工笔重设色画,“练”是一种丝织品,刚刚织成时质地坚硬,必须经过沸煮、漂白,再用杵捣,才能变得柔软洁白。《捣练图》长卷共刻画了12个人物形象,从右至左按劳动工序分成捣练、织线、熨烫三组场面。第一组描绘四个人以木杵捣练的情景;第二组画两人,一人坐在地毡上理线,一人坐于凳上缝纫,组成了织线的情景;第三组是几人熨烫的场景,还有一个女孩淘气地从布底下窜来窜去。画中人物动作自然,细节刻画生动,妇女扯绢时用力地微微后退后仰,表现出作者观察得细致入微。

现存《捣练图》系宋徽宗摹本,原藏于圆明园,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该作对后世绘画影响深远。